

閒談、紀實與對話：宋人筆記與術數知識的傳遞*

廖咸惠**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

摘 要

宋代是士人與術士往來互動的高峰時期，探究兩者之間的頻繁互動，除了從其動機和目的來理解外，還需對士人的術數知識來源及認知有所掌握。他們從何處獲得與術數相關的訊息？這些訊息與他們對術數產生興趣、並將術士視為諮詢對象的關係為何？又為他們在面對眾多術數資源時，提供了什麼抉擇基礎？這些問題的解答，都與宋代士人如何建構術數知識密切相關，也是了解其與術士密切互動的必要前提。本文以筆記為焦點，分析術數知識的流傳及其對宋代士人認知的影響。宋人筆記不僅記載了豐富的術數知識和時人的實踐經驗，其內容也具有廣泛的來源及進一步的傳播力量，因此可以作為窺見士人相關知識來源與認知的窗口，以及這些訊息對於接收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宋代士人，筆記，術數，術士，知識傳播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筆記與宋代士人的術數知識建構」（計畫編號：NSC 104-2410-H-007-027-MY2）的部分研究成果，曾發表於「宋代國際學術研討會：筆記與宋人的知識建構」（新竹：2016年12月17-18日）。感謝評論人梁庚堯先生及與會學者的寶貴意見，並感謝《清華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詳細指正與修改建議。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hhliao@mx.nthu.edu.tw

一、前言

近年來的研究顯示，宋代是士人與術士¹ 往來互動的一個高峰時期：一方面士人為了自身及家族的發達、或是為了知識的探究而頻繁諮詢術士，使得許多術士在士人社群中享有盛名，得以遊走其間；² 另一方面不少術士也積極向士人階層接觸尋求認同，以提升自己的聲望和社會影響力。³ 然而，除了從動機和目的來解釋士、術之間的互動交流外，還可以進一步思考的是，他們之間的頻繁互動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產生。亦即，宋代士人之所以和各式術士接觸，以窺見個人與家庭的未來或是探詢預卜之理，應該是在行動之前已對相關的論命預卜之術，以及可能的術士人選有了相當程度的熟悉和了解，而且或多或少有受到這些訊息的來源所吸引或說服所致。究竟當時有哪些管道在術數知識和實踐體驗上，扮演了重要的訊息傳播媒介，讓宋代士人在這些術數訊息的反覆傳誦下，對於流傳於當時的相關術數，以及前人的術數體驗有所了解，並進而奠定他們接觸、探究，甚或評價術數知識和其知識傳承者的基礎？換句話說，宋代士人如何以及從何掌握當時術數的類別與內涵、獲知聲名卓著的術士動向，以及觀看前賢的術數接觸經驗等問題，都是理解宋代士人和術士關係不可或缺的環節。

從現有的史料觀察，宋人文集和筆記中有最多士人和術數及術士互動的相關記載。就文集而言，與術數相關的記載可以大致分為以下三類：一類是文集作者在敘述自身成長環境時，提及其在家庭生活中所接觸和吸收的術數知識及實踐行為。⁴ 由於這類記載關係到個人的家庭背景，因此是否能代表多數人所共有的成長經驗，仍有討論的空間；再加上當時以儒學為價值的判准下，那些與隸屬「小道」範疇的術數知識接觸經驗，未必都會被作者納入個人的記事，所以也較為零散。另一類

¹ 本文以「術士」泛指具有預測能力者，在宋代有許多不同社會身分的人都具有這樣的能力；他們有些人以此能力為生，有些則只在某些情境中展現這方面的能力。

² 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臺北：政大出版社，2013），頁 15-81；Liao Hsien-huei, "Exploring Weal and Woe: The Song Elite's Mantic Beliefs and Practices," *T'oung Pao*, 91.4-5 (2005), pp. 347-395；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新史學》，20.4（臺北：2009），頁 1-58。

³ 廖咸惠著，上內健司譯，〈墓葬と風水：宋代にお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都市文化研究》，10（大阪：2008），頁 96-115。

⁴ 宋末的文天祥（1236-1283）即為一例。廖咸惠，〈理解天命：文天祥的命運觀與術數知識〉，《漢學研究》，35.2（臺北：2017），頁 225-260。

記載是士人對術士的贈文（以贈詩、序為多），其中主要包含了對特定術士的技術和風格的描述。這類由士人書寫贈送給術士的文章，乍看之下其內容只在兩人之間傳遞，但作者的師友以及術士未來拜訪的其他士人顧客，也可能成為訊息的間接接收者。⁵ 不過，這之間的傳遞規模常因人而異，而且從現存的記載中觀察，相關例證並不豐富。第三類是對特定術數或時人的術數熱情進行分析和評論，這類內容有從理論上駁斥或支持術數知識，也有暗含著維護儒學的命運觀、或是合理化術數存在的各種企圖。⁶ 儘管這類論說看來極具影響力，但是記載中鮮少顯示作者發聲的場景，以及可能的發聲對象，因此除了從文集本身的成書與流通性來理解外，較不容易評估其實質影響力。

相對而言，筆記不但具有更為豐富的相關記載，其內容也經常廣泛的在士人之間傳播，因而成為本文的主要分析對象。仔細觀察宋人筆記的書寫，可以發現其中包含許多前人或時人接觸術數的經驗、流行於當下的術數形式、以及當時聲名卓著的各類術士等訊息。然而，從這些記載中觀察宋代士人的術數知識形成，必需要先瞭解這些豐富多元的訊息究竟從何而來，為何會成為士人筆下的記事內容，記載的對象為誰，又是以怎樣的方式被記載下來，並在多大的範圍中流傳？透過這些問題的釐清，我們不僅可以對相關的術數知識和實踐如何傳播於士人之間，有較為貼近的觀察和理解，也能進一步從其記載內容的類型以及其中隱含的訊息，窺見他們對訊息接收者所產生的影響。本文將從以下三個部分進行討論：首先，分析宋代筆記如何成為士人訊息傳遞管道的一環；其次，透過筆記的記載，觀察士人的閒談話題和內容，特別是例證中涉及的參與者、術數型態，和其凸顯紀實的方式；最後，嘗試從這些相關的記載內容中，解析其可能暗含的訊息，以及這些訊息對於接收者可能產生的影響。

二、宋人筆記：訊息傳遞的平臺

有關宋代筆記的性質問題，學界已從書寫目的和採錄內容等角度進行分析，指

⁵ 廖咸惠，〈體驗「小道」：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

⁶ 劉祥光，〈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頁 83-148；廖咸惠，〈宣揚「正學」：真德秀的性命論與術數觀〉（美國麻州哈佛大學主辦，「九至十五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劍橋：2014 年 6 月 5-7 日）。

出其具有存信史、行教化、記談笑和展見聞等現實的動機，⁷ 和廣泛涵蓋軍政、先賢、風俗及異聞等多元的內容，⁸ 既凸顯宋代筆記的特點，也區隔其和小說的不同。若我們進一步針對筆記內容產生的場景、內容的來源、關注的對象，和流傳幅度進行分析，將會觀察到筆記作為當時士人訊息傳遞平臺的特殊性，進而可以從中窺見宋代士人的社會文化生活面向。首先，從記載內容產生的場景觀察，可以清楚看到宋代筆記經常是孕育於士人日常的燕聚閒談之中，因為大量交換於閒談之際的訊息，往往重現於筆記之中。如張洎 (934-997) 在《賈氏談錄》的序言中就提到，受惠於賈氏（賈黃中）的博學善談，因此在公餘之際將其談話內容「偶成編綴」。⁹ 趙與時 (1172-1228) 的《賓退錄》則是在賓客離開後，自己將與賓客閒談的內容記錄下來的結果：「賓退，或筆於牘，月日滋久，不覺盈軸」。¹⁰ 而歐陽修 (1007-1072) 的《歸田錄》中，也包含不少這類記載：「與士大夫笑談之餘而可錄者」。¹¹ 這些收入筆記中的閒談內容，又反過來經常成為之後士人聚會時的談資。從楊億 (974-1020) 的門生故人在燕聚閒談後，刻意將其談話內容記錄下來的反應，可以預見這類話題將會不斷的在其他聚談場景重現：「門生故人，往往削牘藏棄，以為談助。」¹² 可以說，燕聚閒談不僅是士人社群中常見的活動，閒談內容更經常透露出參與者的共同興趣和關注，並發揮傳播作用。雖然燕聚閒談的場景和內容會隨著聚會結束而消逝，但許多宋代筆記的書寫動機，正是出於捕捉交換於其中的話題和訊息，因此可以作為窺探各式聚談的窗口。

⁷ 宋馥香，〈兩宋歷史筆記的編纂特點〉，《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武漢：2007），頁 72-76；宮雲維，〈20 世紀以來宋人筆記研究述論〉，《浙江社會科學》，1（杭州：2010），頁 97-102；Cong Ellen Zhang, "To Be 'Erudite in Miscellaneous Knowledge': A Study of Song (960-1279) *Biji* Writing," *Asia Major*, 25.2 (2012), pp. 43-77.

⁸ 張暉，〈宋代筆記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丁海燕，〈宋人史料筆記研究——從《四庫全書總目》對宋代史料筆記的價值談起〉，《中洲學刊》，1（鄭州：2004），頁 112-116；Peter K. Bol, "A Literati Miscellany and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ase of Chang Lei's *Ming-tao tsa-chih*,"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 (1995), pp. 121-152.

⁹ 張洎，〈賈氏談錄〉，《宋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序〉，頁 238。

¹⁰ 趙與時，〈賓退錄〉，《宋代筆記小說大觀》第 4 冊，〈序〉，頁 4130。

¹¹ 歐陽修，〈歸田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 3。類似的例子也可見沈括，〈夢溪筆談〉，《全宋筆記》第二編第 3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6），〈自序〉，頁 7；沈作喆，〈寓簡〉，《全宋筆記》第四編第 5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序〉，頁 5；周密，〈癸辛雜識〉（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 1。

¹² 楊億，〈楊文公談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宋庠〈序〉，頁 1。龔明之（約 1091-1182）的筆記，亦有出於「資助談柄」的目的而記錄的意涵存在。龔明之，〈中吳紀聞〉，《全宋筆記》第三編第 7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序〉，頁 167。

若筆記內容產生的場景常與燕聚閒談密不可分，那麼這些談話的內容本身又是從何而來？仔細觀察筆記作者或編者的序言，可以發現那些在聚談中能夠侃侃而談、內容又深具吸引力的發話者，往往有一些共同的特色，而這些特色也正是我們觀察其內容來源的關鍵。在前述張洎的筆下，賈黃中被形容為「好古博雅，善於談論」；¹³ 在宋庠 (996-1066) 的序中，楊億則是被讚為「文辭之外，其博物殫見，又過人甚遠」。¹⁴ 顯然，除了善於談論的能力外，更重要的是，談話者往往還具有博學強記和見聞廣博的特質存在。這些特質意味著其談話內容，不僅有諸多個人的見聞和親身體驗為基礎，也有豐厚的學識底蘊在其中。周密 (1232-1298) 的《齊東野語》，清楚體現了筆記做為聞見和文本知識匯集的成果：

我先君博極群書，習聞臺閣舊事，每對客語，音吐洪暢，纚纚不得休。……余韶侍膝下，竊剽緒余，已有敘次。意嘗疑某事與世俗之言殊，某事與國史之論異。他日，過庭質之，先子出曾大父、大父手澤數十大帙示之曰：「某事然也。」又出外大父日錄及諸老雜書示之曰：「某事與若祖所記同然也。……」……閒居追念得一二于十百，懼復墜逸為先人羞。迺參之史傳諸書，博以近聞脞說，務求事之實，不計言之野也。¹⁵

周密在序文中提及其筆記的內容有多重來源：一為其父親深厚的文本知識和廣博的見聞；二是其父親的言說內容，又有許多是建立在其祖父、曾祖父和外祖父等人的手澤、日錄及前輩雜書之上；三是周密在書寫之際，還參酌史傳及近日的聞見議論，以求符合事實。儘管來源多重，但就其本質而言，明顯可見就是聞見和文本兩類知識的匯集。¹⁶

再者，值得關注的是，在聚談場合中所交流的這些聞見和文本知識，主要涉及的對象是誰？雖然地方風俗、民情和異聞佔據不少版面，但事實上與士人相關的訊息還是最常出現於筆記之中。這個現象並不難理解，因為參與聚談者既以士人為

¹³ 張洎，《賈氏談錄》，〈序〉，頁238。

¹⁴ 楊億，《楊文公談苑》，宋庠〈序〉，頁1。

¹⁵ 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自序〉，頁4。

¹⁶ 錢明逸 (1015-1071) 在《南部新書》序中，強調其父錢易既是「潛心國史，博聞強記」，也是「至於前言往行，孜孜念慮嘗如不及」，亦即其父親的著作亦為文本和聞見知識的匯聚成果。錢易，《南部新書》（北京：中華書局，2002），錢明逸〈序〉，頁1。類似例子，亦可見周輝，《清波雜志》（北京：中華書局，1994），張貴謨〈序〉，頁1。

主，且其談話內容又經常環繞士人的經歷和聞見，所以話題的重心自然落在許多發生在他們這個群體的事物上。筆記的作者或編者，也經常毫不諱言他們記錄士人日常言談以廣傳之的取材傾向。如王得臣（1036-1116）在其《塵史》序中提到，其著作的內容來源除了自己的聞見外，主要就是師友和賓客僚屬的議論或閒談：「故自師友之餘論、賓僚之燕談與耳目之所及，苟有所得，輒皆記之。」¹⁷ 同樣的，魏泰（活躍於北宋神宗至徽宗時期）的《東軒筆錄》序也指出，其書的完成主要受惠於求學過程所交的朋友，以及所交遊的士大夫：「思少時力學尚友，遊於公卿間，其緒言餘論有補於聰明者，雖老矣，尚班班可記，因叢摭成書。」¹⁸ 王闢之（1031-?）和岳珂（1183-1243）更直接的指明，他們著作的內容就是從士大夫的聞見言說而來：「閒接賢士大夫談議，有可取者，輒記之，久而得三百六十餘事，私編之為十卷」、¹⁹「余或從搢紳間聞聞見見歸，倦理鉛槧，輒記其〔程〕上，編已，則命小史錄臧去，月率三五以為常。」²⁰ 無論上述這些作者所提及的是「師友」、「賓僚」、「公卿」，「賢士大夫」或是「搢紳」，在在都顯示這些筆記收錄的內容重心，環繞著士人這個階層。²¹

最後，還要分析的是這些匯聚於筆記中的訊息，是否會再次傳散開來，為更多當時或之後的士人所知曉？其實上述三個面向的討論，已經顯示筆記內容不但是各種士人經歷聞見和文本知識的匯集，而且在其匯集的過程中，無論是聚談發生的場景，或是聚談內容的來源，就已經陸續產生不同程度的訊息傳遞效應。例如同一場聚談場景中，參與者可能各自摘記發表於其中的言談，並做為往後其他燕聚閒談場合的談助。這些讓參與者印象深刻而在腦中、或以紙筆記錄下來的事物，往往又是來自發話者在其他場景獲得的聞見知識，或是之前文本所記錄的事物。在這樣的發展邏輯下，可以自然的推理這些匯集聞見與文本知識的筆記，其內容將又會成為閱讀者增廣見聞，並樂於分享的話題，進而再度受到傳誦。常見的例子是，同一個事

¹⁷ 王得臣，《塵史》，《全宋筆記》第一編第10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3），〈序〉，頁5。

¹⁸ 魏泰，《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1。

¹⁹ 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3。

²⁰ 岳珂，《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1。楊萬里（1127-1206）為《獨醒雜志》所寫的序文中，亦指出其內容「是皆近世賢士大夫之言」。曾敏行，《獨醒雜志》，《全宋筆記》第四編第5冊，楊萬里〈序〉，頁117-118。

²¹ 有些筆記雖然沒有明確使用上述這些詞彙來表達其敘述的對象，但仔細觀察可明顯看出其記載的「前言往行」也是以士人群體為主。例如周輝，《清波雜志》，張貴謨〈序〉，頁1；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原序〉，頁1；范鎮，《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97），〈序〉，頁1。

件會在幾部不同的筆記中被記載，雖然細節上或有差異，但主旨卻是相同。如錢若水（960-1003）和宋初著名隱士陳搏（872-989）的接觸論命之事，就分別出現在北宋釋文瑩的《湘山野錄》和成書於南宋初年的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中。而《邵氏聞見錄》的內容，之後又分別為活動於南宋中後期的張端義《貴耳集》和周密的《齊東野語》所轉載。²²

再者，有些筆記作者甚至直接表明，其書中的記事乃轉載自某某筆記、與某筆記之記載略同，或質疑某筆記之論點等。如南宋高文虎（1134-?）的《蓼花洲閒錄》和成書於高宗紹興十五年（1145）江少虞的《事實類苑》之內容，即多來自諸家筆記，因為在每一項記事之後，作者都清楚註明出處。²³ 釋文瑩的《玉壺清話》雖然沒有逐筆注記出處，但作者在序文中指出其內容廣泛來自國初至熙寧（1068-1077）年間的文集著述。²⁴ 而從周輝（1126-?）《清波雜誌》受到多人作跋的現象，則可以觀察到筆記書寫成文後，往往不只流傳於鄉里故舊之間，也對許多外來或間接聽聞者具有極大吸引力。²⁵ 至於宋代筆記作品的流通狀況，目前雖然沒有相關的整體研究，但從張邦基（生卒年不詳）在其《墨莊漫錄》的跋文中所記，可以略窺一二。跋文中指出：「近世諸公所記，可觀而傳者」，包含楊文公《談苑》、歐陽文忠公《歸田錄》等兼具作者和書名訊息的筆記作品至少四十五種，而且這些還只是部分作品的羅列，因為他說這類著作之多「不可概舉」。²⁶ 若從

²² 釋文瑩，《湘山野錄》（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下，頁 47-48；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 7，頁 70；張端義，《貴耳集》，《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 4 冊，卷中，頁 4287-4288；周密，《齊東野語》，卷 5，〈李泌錢若水事相類〉，頁 85。同樣的，蔡京尋求風水佳地葬父的故事，也分別有幾種不同的版本和內容，出現在多本筆記之中，顯示其反覆被傳誦的性質。如陸游，《老學庵筆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0，頁 132；陸游，《入蜀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4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頁 3a-3b；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下，〈香爐峰桐柏山〉，頁 188 等。

²³ 高文虎，《蓼花洲閒錄》，《全宋筆記》第五編第 10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2）；江少虞，《事實類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其中與術數有關的記事，集中在卷四十九、五十的〈占相醫藥〉門中。

²⁴ 釋文瑩，《玉壺清話》（北京：中華書局，1984），〈序〉，頁 1。

²⁵ 依作者自序的署年，此書約完成於紹熙二年（1192）。之後作者出示該書給友人張貴謨看，張在隔年春亦為其寫序。之後陸續又有知交故舊、或是輾轉得閱該書的文人，為該書寫作跋文。其中 1193 年還有括蒼章斯才、毗陵張訢和吳興陳晦等三人各書寫一篇跋文，1196 年有山陰楊寅一篇，1197 年邗城張巖一篇，1198 年楚龔頤正和天台徐似道各一篇。周輝，《清波雜誌》，〈原跋〉，頁 531-534。

²⁶ 張邦基，《墨莊漫錄》，《全宋筆記》第三編第 9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跋〉，頁 138-139。

張邦基所在的南北宋之交來看，²⁷ 這個數量意味著宋人筆記在當時應是有相當的流通和可及性，所以他才可能舉出如此具體訊息。這些現象顯示，許多的事物透過聞見者反覆述說，並在被記錄和編輯成書後，為聆聽者或閱讀者再次轉述或轉載，因而廣為士人社群所熟悉。在這樣複雜而多元的訊息傳遞中，筆記無疑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平臺，一方面匯集士人的聞見經歷和文本知識，一方面又輾轉將所匯集的訊息傳遞給其他當代或後來的士人知曉，可以說是當時訊息傳遞管道中重要的一環。²⁸

上述的分析顯示，宋代士人在聚談中交流傳遞各種與其社會階層相關的言行事物，其中包含了親見、親歷、聽聞和史籍等不同來源的內容。除了在聚談場合中的交流外，這些交談內容也常被記載下來，或可資助談柄、或為追憶故舊，²⁹ 也經常成為後人援引述說的資源。這其中複雜交錯、循環往復的訊息流動，意味著筆記不僅是當時士人之間各種知識傳散的重要管道，更重要的是，其記載的內容還可說是當時士人關注的焦點，與樂於互相交流的話題。因此，筆記無疑是觀察宋代士人社會生活面向的最佳窗口，包括他們的術數知識累積與形塑。以下，本文將透過對筆記內容的分析，窺探宋代士人究竟接觸了哪些人的術數經驗、認識了哪些術數與實踐形式、得知哪些聲名卓著的術士動態，又對術數表達出怎樣的立場與態度。

三、書寫術數：對象、型態及紀實

仔細分析宋代筆記的內容，可以發現士人談論和記載與術數有關的事件相當豐富。在這類記載中，通常包含三個基本元素：士人、術士，和術數。³⁰ 雖然具備這三個元素，但是每個事件著重的對象並不全然相同，有的以士人為事件的主角，

²⁷ 張邦基的生卒年不詳，但根據書中記載其政和年間侍父於陳州，且相關記載內容的最後年分是紹興十八年（1148），可以推知其為南北宋間人。

²⁸ 傅大為在其〈宋代中國筆記的興盛與知識史的關係〉一文中，以沈括筆記中的烏鬼與黃魚這則記載，不斷為其他筆記所轉載、修正或辯駁為例，說明宋代筆記之間有明顯的「徵引關係 (citation networks)」，亦即形成了所謂的「筆記社群 (biji community)」。這個想像社群的存在，意味著宋代士人之間具有一套共有的知識模式。本文顯示，這樣的關係其實早在士人的宴聚閒談之際，就已經展開，因為宋代士人各式的談話內容，在成為文本記載之前，不斷的在不同場合及對象之間反覆轉述。筆記只是這種複雜的知識與訊息傳遞管道中，較為具體可見的一環。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79),"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 (2007), pp. 103-130.

²⁹ 或是基於存史、或教化等目的。

³⁰ 當然這類記事並不限於士人，有時也涉及其他社會階層的術數經驗。本文分析的對象聚焦於與士人有關的記載。

有的則是將敘述的主軸放在術士及其術數技能上。也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些不同角度的例證中，觀察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及訊息傳遞者或筆記作者對該事件的論說和記載模式。首先，筆記中以士人為主角進行述說的例子最為常見。這類記事對主角的姓名或是字號，以及其處在生命歷程中的哪個階段等，通常會有清楚的描寫，因為這些士人接觸術數論命時的身分狀態，是做為驗證術數預測的重要對照：

呂文穆蒙正少時，嘗與張文定齊賢、王章惠隨、錢宣靖若水、劉龍圖燁同學賦于洛人郭延卿。延卿，洛中鄉先生。一日，同渡水謁道士王抱一求相……。道士曰：「吾嘗東至於海，西至流沙，南窮嶺嶠，北抵大漠，四走天下，求所謂貴人，以驗吾術，了不可得，豈意今日貴人盡在座中！」眾驚喜。徐曰：「呂君得解及第，無人可奉壓，不過十年作宰相，十二年出判河南府，自是出將入相三十年，富貴壽考終始。張君後三十年作相，亦皆富貴壽考終始。錢君可作執政，然無百日之久。劉君有執政之名，而無執政之實。」語遍及諸弟子，而遺其師。郭君忿然，以為謬妄，曰：「坐中有許多宰相乎？」道士色不動，徐曰：「初不受饋，必欲聞之，請得徐告：後十二年，呂君出判河南府，是時君可取解。次年，雖登科，然慎不可作京官。」延卿益怒，眾不自安，乃散去……。其後……。無一差者。³¹

收入王銍《默記》中的這則記事，涉及了宋初五位著名士人在未第前聯袂求相的故事。他們和其久舉不第的老師一同向道士求相，目的顯然是想一窺科舉功名與仕宦前程。道士的預言令人驚異，因為五位學生不僅功名可期，還會陸續升任宰相之位；而他們的老師卻是功名晚成，而且仕途坎坷。事實的發展證明，道士的預言果然一一成真。

這則記事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觀察：首先是其真實性問題。由於記事的内容極具戲劇性，特別是幾位主角都將陸續擔任宰執，因此在引人讚嘆之餘，也讓人質疑是否與歷史事實相符。根據陸游（1125-1210）的觀察和描述，筆記作者王銍不僅是一位博學強記又熟知國老故事之人，而且其侃侃而談的内容，總是符合事實並經得起比對。³²《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也提到，王銍「熟於掌故，所言可據者居多」。³³

³¹ 王銍，《默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中，頁32-33。

³² 陸游曾形容此筆記作者王銍：「記問該洽，尤長於國老故事，莫不能記。對客指畫誦說，動數百

這些評價顯示，在當時和後人眼中，其記事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另外，儘管我們在現存的文獻中沒有發現相同的記載，以佐證其真實性，但是一則出現在張師正(1017-?)《括異志》中的記事，透露出了類似的訊息，也間接證明上則記事至少具有部分的事實。³⁴ 該則記事提及有師友關係的郭延卿和呂蒙正、張齊賢三人，聯袂拜謁當時具有知人能力之盛名的道士陳搏，並且也從陳搏口中獲得類似的預言：呂、張兩位學生未來福祿延永，但老師郭延卿卻是祿薄。比對這兩則記事可見，雖然參與求相的人數不全然相符，且尋求諮詢的對象也不同，但是其中部分士人的師友關係，³⁵ 以及他們在獲得功名之前曾聯袂求相的部分，則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這部分應有相當的可信性。³⁶

其次要觀察的是，士人、術數和術者之間的互動關係。這群士人求相（無論是王銍筆下的師友六人，或是張師正所描述的師友三人）以求窺見未來的舉動顯示，其既是出於追求科名和仕宦前程的動機，也是抒發壓力的出口。雖然正面的命運預測不一定能保證未來的成功，進而解除問命士人的壓力，但是負面而且有違常理的

千言，退而質之，無一語謬」。陸游，《老學庵筆記》，卷 6，頁 77。

³³ 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41，頁 17a。王銍出身於學者之家，祖父王昭素為北宋著名學者，父親王萃曾從學於歐陽修，並有藏書萬卷。這些家庭學術背景，也可能是王銍博學和熟於掌故的因素之一。

³⁴ 根據這則記事末尾的說明，其內容輾轉來自多手的傳播：「進士魏泰聞之陸修撰經，云其始末甚詳。」亦即，作者張師正從魏泰處得知此事，而魏泰又是聽聞自陸經。由於陸經曾在宋仁宗時官至集賢院修撰，並與歐陽修、蘇舜欽輩游，故其訊息的來源有可能是任朝官期間得知，或從歐陽、蘇等人處聽聞。張師正，《括異志》，《歷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 2，頁 21。

³⁵ 若從他們的生卒年來看，王銍筆下描述的五人似乎很難湊在一起拜郭延卿為師，並聯袂訪謁論命道士。因為故事應發生於呂蒙正登第前，亦即太平興國二年（977）之前，然而生於太祖開寶七年（975）的王隨，當時最多才兩、三歲，顯然不可能一起從學和問命。因此，只能說這則記事具有部分事實。

³⁶ 在陳鵠（生卒年不詳）的《西塘集耆舊續聞》中也有一則同類型的記事，其中涉及某相士在一日之內有張士遜、寇準、張齊賢和王隨等四位未來的宰相先後求相的奇事。陳鵠雖然生活於南宋時期，但記事中收載許多北宋人物故事，而這些故事的來源一方面說明其紀實性，一方面也印證筆記為聞見和文本知識的匯集。例如此則記事是他從范鎮的《東齋記事》（文中誤植為《蒙求》）中得知，而范鎮又是從張士遜本人處聽聞。記事中的張齊賢和王隨二人，與王銍筆記記事中的人物重疊。此外，張齊賢的不同求相行為，分別出現於王銍、張師正和陳鵠等人的筆記中，顯見宋初士人與術士之間的密切接觸，恐怕並非偶一為之的特例，而且還是宋人反覆津津樂道的話題。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北京：中華書局，2002），卷 7，〈相士趙蓂衣及相國寺卜者〉，頁 363；〈汴岸日者〉，頁 360。根據宋人朱翌（1097-1167）的分析，這類型的記事可以追溯至《史記·魏相傳》，之後《唐史·方技傳》也有相似案例。朱翌，《猗覺寮雜記》，《全宋筆記》第三編第 10 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卷下，頁 69。

預測，卻經常引起問命者的不滿。正如文中的郭延卿，雖然被眾人尊奉為師，也自年少時便以學問品行著名於鄉里，³⁷但在功名仕宦之途上，卻遙遙落後於眾人，甚至有待後者的提拔才有短暫的仕途。他特別不服氣的是，當這位道士對自己五名弟子的功名仕宦際遇侃侃而談、且許予他們暢達的前程時，獨獨略過他這位為師者的命不談，所以用質疑的口吻反駁道士的預言：「坐中有許多宰相乎？」而當道士終於針對他的際遇發言時，結果卻是令其失望的功名晚成預測。反諷的是，在這些相關的記事中，儘管問命者可能以常理推斷而對未來命運的預測抱持懷疑，但是常理推斷卻未必能反駁冥冥中命運的安排。因為敘事中提及，郭確實在呂蒙正登第入仕十二年後才得解、並於次年登科。而幾位學生的仕宦也一如論命者所述，陸續擔任參與國家機務之職。

無論如何，選擇有精準預測能力的對象進行諮詢，似乎還是獲得準確預測的重要前提。在王銍的記事中，師友六人之所以拜謁道士王抱一求相，顯然是經過仔細選擇下的結果。這位道士的特出之處可從兩方面觀察到：一是透過對其弟子的訓練，顯示道士在相命上的深厚能力。六人首次造訪時，因道士出門不在而想請其弟子來論命，然而這位學術數於道士三十年的弟子不但是位僧人，而且還因師父曾告誡「術未精切，慎勿為人言」而不敢從命。能吸引僧人來從學，而且從學者歷經三十年學習還未達精切，顯示道士相命之術的高深莫測。再者，道士本身的話語，也顯示其對自己能力的高度自信。從故事中道士自述其行遍大江南北，只為遇到貴人以驗證其相術的精準來看，若不是這位道士對自己的相術頗為自負，就是他刻意宣揚自己的術數實力，以說服上門求相的訪客。師友六人的造訪，無疑是受到其聲名的吸引，並恰恰造就了其一展相術長才的機會。不過，由於師友六人的際遇，前後橫跨太宗至仁宗數十年，才陸續獲得驗證，因此這件事即便符合事實，也很難能為他們同時代的人所記載。

最後要觀察的是，此則故事的論說和記載模式。這則故事之所以被記錄下來，應該是和其涉及的內容密切相關。一方面故事中的主角，是多位後來陸續成為宰相之宋初著名士人，其身分和動向對於以入仕為目的的士人而言，必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其次，士人主角向一位對相術頗為自負的道士求相，詢問所有士人都關心的科舉和仕宦前程問題，此現象無疑也與當時士人的生命經驗緊密相關。再者，過程中有出人意外的插曲，即道士的預測與世俗預期相違，並造成問命人的不認同。在這樣的矛盾與不滿下，究竟是常理判斷還是相術預測值得信任，更讓聆聽者或讀者

³⁷ 張師正，《括異志》，卷2，〈郭延卿〉，頁21。

好奇。最後，事實的發展顯示，相術的預測「無一差者」，成為最後的勝出者。由於這類敘述經常出現在筆記中，可以推想他們可能曾是、也必然會是士人聚談頻繁出現的話題之一。無論這則記載是王銍將聞見中得到的訊息抄錄下來，還是他在書寫時將事情的順序重新編排以增加戲劇性，其內容本身都透露出士人內心共有的焦慮和期待。亦即，在科舉和仕宦的吸引，及其高度不可掌握性下，士人除了認真苦讀外，如何面對其他不可預期的部分，又如何尋求可能的撫慰和壓力出口，都是與切身極為相關的問題。前賢的親身經歷和體驗，無疑是那些在科舉和仕宦之路上匍匐前進的士人最好的參照點，深深的吸引著他們的目光。

當然，筆記中有關術數的記事，並非侷限於以士人為主角的類型上。因為，以術士及術數為主角的記事，也經常可見。但有趣的是，在彰顯術士特質及其術數能力時，這些記事中依然有許多士人的身影出現，既是術士互動的對象，更是其術數技能的重要認證者。沈括 (1031-1095) 筆下的吳僧文捷，即是一例：

吳僧文捷，戒律精苦，奇跡甚多。能知宿命，然罕與人言。予群從文通〔沈邁〕為知制誥，知杭州，禮為上客。……浙人多言文通不壽，一日齋心往問捷，捷曰：「公更三年為翰林學士，壽四十歲，後當為地下職任，事權不減生時，與楊樂道待制聯曹，然公此時當衣衰經視事。」文通聞之，大駭曰：「數十日前曾夢楊樂道相過云：『受命與同公〔公同〕職事，所居甚樂，慎勿辭也。』」後數年，果為學士，而丁母喪，年三十九歲。明年秋，捷忽使人與文通訣別。時文通在姑蘇，急往錢塘見之。捷驚曰：「公大期在此月，何用更來？宜即速還。」屈指計之，曰：「急行尚可到家。」文通如其言，馳還徧別骨肉，是夜無疾而終。捷與人言多如此，不能悉記，此吾家事耳。³⁸

此則記事中的主角文捷，是一位嚴格遵守戒律的僧人，同時也具有罕與人言的預知命運能力。其不凡的預知能力，清楚顯現在與士人沈邁 (1025-1067) 的互動過程中。由於家鄉杭州的地方人士多傳言沈邁不長壽，³⁹ 所以他特地前去請謁文捷。文捷的回答包括沈邁未來的仕宦升遷、年壽，以及死後際遇。其中，有關其死後任

³⁸ 沈括，《夢溪筆談》，卷 20，「神奇」，頁 153-154。

³⁹ 雖然文中並未提及何以會有沈邁不長壽的傳言，但很有可能是，曾有不少其他術士做過類似的預卜所致。如本文中提到的周必大母親，就曾算過多次命，而且那些術士一致表示她「壽當至四十七」。

職地下世界的預測，因與沈邁本人的夢境相符，隨即獲得印證。仕宦升遷部分，也在數年後實現，再次證明文捷預測的精準。也因此，當文捷預告沈邁壽終時刻迫近時，後者毫無懷疑的火速返家並與家人進行訣別，隨後果然如預測所言壽盡於當夜。

我們依照上述以士人為主角之記事的分析原則，來對這則記事的性質進行相同的討論。首先，是關於記事內容的真實性問題。因為這則記事中涉及的士人是作者沈括的從侄，⁴⁰ 所以其內容並非得自聽聞轉述或轉載，而是如作者所言：「此吾家事耳」，深具紀實性。再加上記事的内容，並無標榜沈邁功名、仕宦或德行等正面的敘述，反倒涉及其年壽不長的說法，因此作者更沒有任何理由為了凸顯僧人的預測之術，而進行相關內容的編造。不過，即便是屬於紀實性的記事，還是難免有與史實些微出入而引發質疑之處，特別是沈邁的年壽部分。記事中提及僧人預測沈邁的年壽為四十，而沈邁也確如預測所言，在三十九歲丁母憂的隔年離世。這個年歲和經歷，完全符合《宋史·沈邁傳》中的敘述：「丁母憂……。服未竟而卒，年四十。」⁴¹ 可是，若進一步比對其他相關史料，會發現當時還有對其年壽的不同說法，即沈邁雖於丁母憂時離世，但離世時年壽是四十三。例如，與沈邁有密切私交且為其撰寫墓誌銘的王安石（1021-1086），就有如此的描述：「公居喪〔母夫人〕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⁴² 除了年歲部分不合外，墓誌銘中提到的丁母憂和赴蘇州之舉，都與沈括的記事相符。另外，宋代藏書和目錄學家陳振孫（1179-1262）也指稱沈邁離世時已超過四十歲：「卒時年四十餘」。⁴³

⁴⁰ 沈括雖為沈邁之堂叔，但其年紀實少於沈邁。《宋史·沈邁傳》中稱其從弟為沈括，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對二人叔姪關係的指稱，多受到後人的認可。如《四庫全書》的沈邁《西溪集》提要，便稱沈括為沈邁之從叔。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第 674 冊，卷 17，頁 24a；沈邁，《西溪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097 冊，〈提要〉，頁 1a-1b。

⁴¹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331，〈沈邁〉，頁 10652。

⁴² 王安石，《臨川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105 冊，卷 93，〈內翰沈公墓誌銘〉，頁 5a-7b。清代著名藏書家陸心源（1834-1894）在其著作《三續疑年錄》中，也是根據王安石的記載，而定沈邁生於天聖三年（1025），卒於治平四年（1067），生年四十三歲。陸心源，《三續疑年錄》，《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5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15b-16a。關於王、沈二人的互動關係，參見張滌雲，〈關於王安石使遼與使遼詩的考辨〉，《文學遺產》，1（北京：2006），頁 73-82；王育濟，〈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親〉，《東嶽論叢》，22.3（濟南：2001），頁 106-111。

⁴³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 17，頁 23b-24a。一首掛名為沈邁所寫的詩文內容，也顯示其年壽四十三的可能性：「四十三年夢寐間，夢中之夢不堪圓，閱來世事同歸盡，得箇人身似可

儘管上述記事中出现人物的年歲與史實有些微出入，讓我們對這類強調「紀實性」的筆記內容有所保留，不過這並不會影響我們從中觀察士人、術士和術數之間的互動關係。從士人如何以及為何和術士及術數接觸，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他們之間關係的建立模式。沈邁如何和知命僧人文捷有了接觸，並進而向其探問未來？作者在記事中雖然指出文捷鮮少談及其具有知命的能力，但是從沈邁向其問命的舉動顯示，其知命的聲名應該還是為人所知的。至少，沈邁必然是有這方面的聽聞，所以才會以上客之禮對待文捷，並在初步體驗其預知能力後，進一步向他問命。⁴⁴ 至於他問命的內容和動機，除了文中所說對壽命的在意之外，很顯然也包括了多數士人極為關心的祿命部分。因為，文捷的回答不僅包括了沈邁在人世的仕宦升遷，也涉及其死後在地下世界任職的預測。從這些互動可以再次看出，士人與知命者的接觸，並非是一種盲目的行動，而是經過仔細選擇、且往往是建立在知命者的聲名上。這樣的選擇和考量，很可能只是建立在之前的聞見知識上，而且接觸之前也未必完全相信該知命者的能力。然而，當知命者的某些預測獲得印證後，士人對其信任度便逐漸增強，且依賴其幫忙解惑的傾向愈加明顯。最終，二者之間可能建立起長久的友好關係，甚至出現如沈邁臨終時對文捷全然的言聽計從現象。此外，宋代士人之所以與知命者頻繁接觸，也往往有很明確且共同的動機：他們對於科名和仕宦的高度關注、和隨之而來的壓力和挑戰，往往是他們問命行動的重要催化劑。

最後，要分析的是這則故事的論說和記載模式。首先，由於故事是以知命僧文捷為主角，因而如何凸顯其知命的能力，應該是故事的重點。從內容來看，作者強調的似乎不是其知命的方式或技術層面，因為文中沒有這方面訊息的相關敘述。讀者既無法得知其知命能力從何而來，也看不出其預測技術的類型或獨特之處。真正凸顯其知命能力的是，文捷對沈邁壽、祿命的預測及其應驗的過程。換言之，沈邁的親身體驗，才是認證文捷知命能力的關鍵。也因此，沈邁親身體驗的真實與否，將決定文捷知命能力的可信程度。作者在此展現十足的把握，因為整件事情是發生在自家之中，他擁有第一手的訊息，可能也是親身的見證者，所以能以紀實性的敘述，凸顯文捷的精準預測。對沈括而言，這則故事之所以值得述說或記載，是因為

憐……。」不過，現代學者研究指出，這首詩的作者應該是北南宋之際的高登（1104-1159）而非沈邁。蒲積中，《歲時雜詠》，《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 1348 冊，卷 6，〈人日書事〉，頁 3b-4a；周小山，〈「補《全宋詩》沈邁詩六十四首」質疑〉，《古籍整理研究學刊》，3（長春：2012），頁 59-60。

⁴⁴ 在此次問命之前，沈邁曾體驗過文捷的預知能力：沈邁曾私下學誦〈揭帝咒〉，當時並無人知曉，但文捷不但知道其誦咒的事實，而且還能精準指出其所誦內容缺漏一句的現象。沈括，《夢溪筆談》，卷 20，「神奇」，頁 153-154。

這位僧人不但能預知未來，而且精準到可謂神奇的地步。⁴⁵ 事實上，仔細觀察《夢溪筆談》的成書可以發現，這則記事的内容應該早在行諸文字之前，即已為沈括在其朋友之間所講述，因為筆談所記多為平日與賓客的言談：「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於筆」。⁴⁶ 也就是說，在它被依照一定門類而編入《夢溪筆談》之前，早就以個別的事件在士人聚談的場合中被述說，甚至陸續在其他聚談的場景中被反覆轉述。

上述的討論雖然只環繞在兩則不同的筆記記事上，但是從這兩則分別以士人和術士為主角的記事上，我們可以觀察到許多共同的特徵。兩則故事無疑都在紀實性的心態下被記載，因為作者或因家中豐富的藏書及生長於仕宦之家，而成為博學且嫻熟於國朝掌故之人；或因有機會獲得第一手訊息，而得以提供親聞甚或親見的事件。不過，這些深具紀實性的記載，未必代表其內容與史實完全相符，其中仍然可能出現與史實有出入之處。無論原因為何，這些差異並不妨礙我們從中觀察宋代士人和術士／數之間的互動關係。很明顯的，這些和術士或術數相關的話題之所以反覆出現在士人的聚談之中，並陸續被轉述、記載和轉載，都是因為它們與士人的生命經驗息息相關。最明顯的是，記事中的主角既在追求功名和仕宦之路上努力，也在追求的過程中遭遇壓力；他們面對這些挑戰的方式，和尋求可能的壓力出口等行為，雖是個人的體驗，但也往往是他人得以參照之重要標的，因而成為士人關注並反覆傳誦的話題。而從作者論說和記載的方式也可看出，這類故事極具戲劇性、或富含神奇意味，而且常常超越常理能夠判斷的範圍，因而成為士人口中樂於傳述、或筆下經常記載的對象。

⁴⁵ 這則記事收錄在《夢溪筆談》的「神奇」分門中。雷祥麟和傅大為的研究指出，透過《夢溪筆談》中的門類比較，可以擺脫現有知識分類的屏障，進入沈括的知識世界，進而瞭解分置於不同門類中的預知故事的區別所在。然而，本文認為，若從聆聽者和讀者的角度而言，沈括的分類和記事內容何者對當時士人的影響較大，仍須再做觀察。雷祥麟、傅大為，〈夢溪裡的語言與相似性——對《夢溪筆談》中「人命運之預知」及「神奇」、「異事」二門之研究〉，《清華學報》，23.1（新竹：1993），頁 31-60。

⁴⁶ 沈括，《夢溪筆談》，〈自序〉，頁 7。此外，《夢溪筆談》一書成於沈括移居潤州（江蘇鎮江）期間，約 1088 年前後，與沈遘之死（1067）已相隔二十餘年。假如此事真讓沈括覺得神奇無比，而置放於「神奇」門類之中，那麼他更可能在沈遘死後便向友人談及此事。

四、解讀訊息：術數記事的影響

宋人筆記可以作為觀察士人吸收術數知識的窗口，不僅是因為其內容具有反映歷史事實的性質，也與其具有訊息傳遞的功能有關。而歷史事實和訊息傳遞兩者之間又是相輔相成的，因為唯有當記載內容被視為具有真實及可信性時，接收者才可能被說服並繼而將之反覆的傳誦。而且也唯有筆記具有紀實和傳播性，廣泛流傳於士人社群，我們才得以從中窺見術數知識在宋代士人社群之間的傳遞路徑和形塑方式。從學界大量採用筆記史料作為探究宋代社會文化的基礎可見，學者早已將筆記作為理解歷史事實的窗口，或是窺見時人的想像或心態的對象。也因此宋代筆記記事的真實性問題，近年來逐漸成為研究者討論的議題。例如，針對《夷堅志》這份單一筆記進行分析時，學者即強調作者洪邁的「紀實」心態。儘管其記載內容可能因為輾轉傳播的路徑，而有訊息矛盾或不實的可能性存在，然而，這些看似矛盾或不實的內容，因為是當時人廣為流傳、並信以為真的對象，所以某種程度而言，仍然不違背其作者「紀實」的初衷。⁴⁷ 而針對宋代多份筆記進行探究的學者，也觀察到「紀實」不但常是這些筆記作者的共同宣稱，也是他們凸顯其著作的存在價值和合理性的重要理由。⁴⁸ 然而，如何解讀這些紀實性的記事所傳遞出的訊息，以及它們對訊息接收者所產生的影響，仍是一個須要進一步分析的問題。

我們可以先觀察的是，這些記事的作者是否企圖透過其書寫，來傳遞某些特定的訊息。從上述的兩則記事中可以清楚看到，兩位作者的談論和記載確實有其各自的目的。就王銍或其他傳誦類似記事的作者而言，長於國朝故事並經常在士人的聚會中暢談者，其敘事內容除了能助談柄外，一個更明確的目的就是保存前言往行，讓後代子孫也能知曉，進而能有存史、教誡，甚或強化品德和器識的功能。⁴⁹ 而另一個未言明的可能目的則在於，透過國朝故事的述說，可展現自身與家庭豐厚的國學知識與官場人脈。另外，就沈括而言，其敘事的內容主要在於分享、或傳遞一

⁴⁷ Alister D. Inglis, *Hong Mai's Record of the Listener and Its Song Dynasty Context*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⁴⁸ Cong Ellen Zhang, "To Be 'Erudite in Miscellaneous Knowledge': A Study of Song (960-1279) *Biji* Writing," pp. 43-77.

⁴⁹ 如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原序〉，頁 1；龔明之，《中吳紀聞》，〈序〉，頁 167；曾敏行，《獨醒雜志》，楊萬里〈序〉，頁 117-118；錢易，《南部新書》，錢明逸〈序〉，頁 1；孫升述，劉延世錄，《孫公談圃》，《全宋筆記》第二編第 1 冊，劉延世〈序〉，頁 139-140。

個他個人所見證的神奇事件，即個人的祿、壽命可以被精準的預知，而且不容質疑。換言之，儘管兩則記事都涉及士人與術數，但很明顯的，作者記載的主要目的，既非宣傳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也不是推廣術數的功能。然而，對聆聽或閱讀者而言，他們從這些記事中所獲得的訊息，並不一定和敘述及記載者預設的目的相符，因此受到的影響也不能光從記事者的角度來理解。仔細觀察相關記事中一些反覆出現的內容，以及可能傳遞出的訊息，將更能掌握他們對於宋代士人術數知識形塑的影響。

在與術數有關的記事中，至少有四種反覆出現、並會對接收者造成影響的內容存在。其中一個最常見的敘事是，士人向知命或善相者問命、或被其告知未來的際遇。這樣的內容在記載宋初之前史事的筆記中並非主流，而是在與宋代相關的筆記記事中才大量出現。例如，在幾部記載唐和五代十國故事的宋代筆記中，向知命或善相者諮詢的主角，有不少是皇室成員或高階的文武官員，詢問的內容多環繞於皇權、政情和兵事等與政軍相關的議題上。⁵⁰ 不過，隨著記事內容轉向宋代，問命的主角大幅擴大到一般的官員和士人階層，詢問的內容也由軍政等國家大事，向科舉功名、仕宦前程和年壽等個人際遇上傾斜。當這些前言往行在士人聚談場合中屢屢被述及、而後被訴諸文字，輾轉為更多的人所傳述和轉載時，接收者無疑會從中獲得一個印象：這些前賢士大夫的生命中，似乎經常充斥著知命或善相者的身影。其中有些前賢士大夫是根據這些人的聲名，而前去求相問命；有些則是受到這些人的主動拜謁，而獲知個人未來的際遇。由於這些前賢士大夫最終多聞名於科場和仕宦之途，在許多士人眼中可謂是重要的角色模範，因此，他們求相問命的行為也間接成為其角色典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樣的形象和訊息，對於接收者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若說它有助於合理化、甚至強化士人與術數之間的接觸行為，顯然是符合邏輯的推論。

第二種反覆出現的敘事是，這些知命或善相者的預卜，大多都有驚人的準確性。在上一節所引的兩則記事中，王銍對於道士預測的精準性，是以「無一差者」來總結；而沈括對知命僧的預測，也有相同的看法，並指出該僧這樣準確的預測經常可見：「與人言多如此」。類似的評價不僅出現在這兩則記事中，也經常在其他

⁵⁰ 如史溫，《釣磯立談》，《全宋筆記》第一編第4冊，〈趙王李德誠〉，頁217；張舜民，《畫墁錄》，《全宋筆記》第二編第1冊，頁206；佚名，《五國故事》，《全宋筆記》第一編第3冊，卷上，頁242-243；卷下，頁246-248；孫光憲，《北夢瑣言》（北京：中華書局，2002），〈駱山人告王庭湊〉，頁34-35。

士人與術數互動的記事中可見，從「無一不驗」、⁵¹「無小異者」、⁵²「已而信然」、⁵³「皆大／有驗」、⁵⁴到「無一不如某之言者」⁵⁵等用語，⁵⁶在在顯示筆記作者對於預測之術的普遍認肯。而那些以紀實性口吻記載下來的內容，往往對於預測的準確可信性更有加成效果。《清波雜誌》中一則關於吳錫鄉僧道昌的相術敘述，就是以親見或親聞的語氣，再加上戲劇性的轉折，流露出這位僧人的精準預測能力。⁵⁷在簡單描述道昌的生平和其相術的由來後，作者周輝一共舉出自家三位長輩，以及一位父親同僚的具體例證，說明道昌相術的奇妙之處。四個例子的共同點在於，道昌的預測因有違常理而在當下都不為當事人認可，甚至還引發他們「痛詆其妄」、或「大怒，欲治之」的反應。⁵⁸但有趣的是，每一個例證演變的結果卻都與道昌的預測完全相符，難怪他在公卿大夫之間受到的評價是「語多奇中」。

需要說明的是，筆記中並非沒有對預測之術質疑或批評的記事，⁵⁹但與對術數持肯定態度的例子相比，這類例子明顯少見。此外，許多例子雖以質疑口氣為出發點，但整體記事內容傳達出的卻可能是對論命預卜認肯的意味。周必大在談及母親年壽時，流露出的就是這樣曲折幽微的態度。⁶⁰他提到母親生於徽宗崇寧壬午(1102)、卒於高宗紹興戊午(1138)，享壽三十七歲。然而，在母親生前，多位精於算命的術士都曾一致表示她「壽當至四十七」。這個十年壽命的差別，與母親生前曾因自己母親（即周必大之外祖母宋氏）病重，以「願損己十年」來延母命而請命於天，似乎有著難於言喻的巧合。他一方面對算命術提出質疑：「陰陽家之說固未可深信」，但另一方面又苦於無法解釋其巧合現象：「然何為數之符也？」直到他

⁵¹ 蔡條，《鐵圍山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3，頁42-44；龔明之，《中吳紀聞》，卷2，〈軌革卦影〉，頁206；卷5，〈鄭應求相〉，頁257。

⁵² 魏泰，《東軒筆錄》，卷6，頁65。

⁵³ 張耒，《明道雜誌》，《全宋筆記》第二編第7冊，〈衛朴〉，頁23。

⁵⁴ 岳珂，《程史》，卷3，〈姑蘇二異人〉，頁33-36；卷15，〈楊艮議命〉，頁175-176。

⁵⁵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16，頁176-177；歐陽修，《歸田錄》，卷1，頁3。

⁵⁶ 其他類似的形容詞還有：「何其驗也」、「不差毫發」、「其言皆驗」、「已而皆驗」等不一而足。孫光憲，《北夢瑣言》，卷12，頁266；曾敏行，《獨醒雜誌》，卷1，頁119；周密，《齊東野語》，卷8，〈韓槌奇卜〉，頁137-138；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宋代筆記小說》第8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卷4，〈謝石拆字〉，頁6b-7b。

⁵⁷ 周輝，《清波雜誌》，卷11，〈道昌相〉，頁485-486。

⁵⁸ 類似反應也可見張齊賢，據載他在十六歲時發解入京，從汴岸日者問休咎。日者的預測因與常理不合，讓他「大怒」並「拂衣而去」。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7，〈汴岸日者〉，頁360。

⁵⁹ 如洪邁，《容齋三筆》，《全宋筆記》第五編第6冊，卷2，〈占術致禍〉，頁22-23；楊億，《楊文公談苑》，〈王延範誤惑於術人〉，頁174。不過，許多相關的質疑是以風水之術為對象。

⁶⁰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卷4，〈記先夫人損壽〉，頁11a-12a。

讀了唐庚 (1069-1120) 為其母親史夫人所寫的行狀，心中這分糾結才有了舒緩。史氏因夫病重而請願要代他而死，就在爐香都還未燒完前她就暴斃而亡。這則記事讓他深刻體驗到世俗之說並不荒唐：「祈損壽以益人者，所損如其言」，而這樣的體認似乎也間接認肯命術的可信性。另外，有些士人作者則可能因此而對人生歷程有所體認，進而發出「生死禍福皆有定數，不可幸免也如此」的感慨。⁶¹

造成這種認可多於批判現象的原因，無非與筆記的性質息息相關。如前所述，宋代筆記收錄的內容，多來自於士人的燕聚閒談，特別是那些引人興趣和關注的話題。因此，許多深具戲劇性和神奇性的精準預測，就常會出現於聚談以及筆記書寫之中。而那些從儒家角度批判世俗信仰、帶有強烈說教意味的言說，則較少成為這種輕鬆閒適場景中的話題。換言之，儘管宋代士人並非對術數預測都抱持支持和肯定的態度，⁶² 但是在以聚談內容為主要收錄對象的筆記中，神奇精準的預測事件話題性高，因此佔有相當高的比例。這些反覆出現的精準預測，無形中向其讀者傳遞了術數論命「必靈」、「必驗」的印象，進一步強化了求相問命的可行性。即便沒有促成訊息接收者具體的求相作為，這類敘述至少也常會引發士人力圖求證的心態。在《入蜀記》中，陸游就體現了這樣的好奇心與求證行為。因為他曾聽友人提及，秀州（浙江）崇德縣有一位名為吳隱的市民不只能言易數，還能預知人的吉凶壽夭，相當引人注目，所以在赴任行程中路過該地時，便特別向前來接待的地方官詢問相關訊息。經崇德縣令吳道夫的回覆，他確認了這則來自友人的訊息正確無誤，並將其詳細記載下來。⁶³

第三種反覆出現於筆記中的訊息是，宋代知命善相者似乎遍在於社會的各個角落，而且橫跨不同社會階層與身分。在前述的兩則記事中，知命善相者分別為道士和僧人。在其他的筆記記事中，我們還可輕易發現其他不同社會身分的人，也具有預見未來的能力，並在宋代士人的生活世界中扮演著深具影響力的角色。例如，那些被概括描述為「術士／者」、⁶⁴「日者」、⁶⁵「相工／者」、⁶⁶或「挾術」⁶⁷

⁶¹ 周密，《齊東野語》，卷 19，〈賈氏前兆〉，頁 354。

⁶² 對於術數的質疑和批評，也可以在筆記中找到，如朱翌在其《猗覺寮雜記》中，對八字和五音表示質疑，但對星命、相術、夢卜和物兆則採取認肯的立場。不過，類似的質疑及深入的批評，更常出現於士人的文集之中。如王安石就曾指出當時論命術士充斥於世的現象，並批評這些論命之術並非古來所有，因為士人汲汲於功名仕宦的追求，頻頻向這類術士求助，促成了後者的多樣化發展與無所不在。朱翌，《猗覺寮雜記》，卷上，頁 52；卷下，頁 55-56、66、67、69、77、82；王安石，《臨川文集》，卷 70，〈汴說〉，頁 5b-6b。

⁶³ 陸游，《入蜀記》，卷 1，頁 3b-4a。文中提及的友人為戴幾先 (1124-?)，字子微，江蘇無錫人。

⁶⁴ 張端義，《貴耳集》，卷中，頁 4282；卷下，頁 4319；周密，《癸辛雜識》，續集上，〈江西數

者，通常是以各種預測之術而謀生者。他們可能遊走於各地尋找可能的顧客，也可能在人群出入頻繁之處定點服務，算是職業的命運預測者。解試、省試和殿試所在的州衙或都城，因為是科舉考生匯集之處，更是這類術士聚集賣藝的重要場所。除了專業術士外，還有一些被稱為「異人」⁶⁸者，通常是行事作風明顯異於常人、又具有特殊能力的人，往往也具有神奇的預見未來能力，或是會將其預測之術傳授給有緣者，但未必是以此技術為生。同樣的，他們也有遊走各地和定點服務的模式，但大部分還是以行蹤不定為特徵，較符合其「異人」的稱號。

士人雖是筆記中問命求相隊伍中的大宗，但其實不少宋代文武官員或儒士本身，也常被敘述為能知人或知命，並在選拔官員、仕宦升遷、科場際遇、禍福災祥、個人壽命，甚或尋人等議題上，展現精準的預測。有些人的能力得自於上述的異人，如錢若水及獲得其技術傳授的楊億就被稱為「有知人之鑑」；⁶⁹有些人則是來自對相關相書的考究，如徐謂禮（1202-1254）因涉獵袁、李之書，而自誇閱人貴賤多奇中；⁷⁰或是以相書作為論命的參考，如陸軫（1012 進士）曾察覺到自己面部形貌的變化，透過相書所言觀察比對數月，企圖從中窺見自己的仕宦前程。⁷¹還有些人的論命能力來源雖沒有清楚敘述，但其名聲卻會吸引其他士人一窺命運的興趣，如徽宗崇寧年間一名調官京師的武人，即因「以相術自名」而讓陸佃（1042-1102）向他詢問朝中貴人的動向；⁷²以知人自許的蕭注（1013-1073）在上殿奏對後，為神宗皇帝詢問到「今臣僚中孰貴」的問題；⁷³而仁宗慶曆年間遭罷相的章得象（978-1048），則是在同僚面前以出生的年月日時為基礎，精準的預測了宰相和樞密使的人選。⁷⁴

者奇驗》，頁 124；陸游，《老學庵筆記》，卷 9，頁 112。

⁶⁵ 王銍，《默記》，卷中，頁 29-31；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 7，〈汴岸日者〉，頁 360；〈相國寺日者〉，頁 361-362。

⁶⁶ 洪邁，《夷堅志·支丁》（臺北：明文書局，1982），卷 10，頁 1047-1048。

⁶⁷ 張端義，《貴耳集》，卷下，頁 4319；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卷 4，〈高逸·史延壽〉，頁 47；蘇轍，《龍川略志》（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2，〈趙生挾術而又知道〉，頁 9-10。

⁶⁸ 王曾，《王文正公筆錄》，《全宋筆記》第一編第 3 冊，頁 265；錢易，《南部新書》，卷丁，頁 53-54。

⁶⁹ 歐陽修，《歸田錄》，卷 1，頁 3。

⁷⁰ 周密，《齊東野語》，卷 17，〈徐謂禮相術〉，頁 310-311。袁、李指的是唐朝初年著名相士、占卜和天文學家袁天罡（生卒年不詳）和李淳風（602-670）。

⁷¹ 方勺，《泊宅編》（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8，頁 48。

⁷² 陸游，《家世舊聞》（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上，頁 187-188。

⁷³ 周輝，《清波雜誌》，卷 4，〈蕭注人倫〉，頁 161-162。

⁷⁴ 魏泰，《東軒筆錄》，卷 14，頁 159-160。

此外，為數不少的吏員下屬、僕役還有婦女，也都以知命或善相之姿，出現在宋代筆記的敘事中，並在士人社群或家族中發揮影響力。例如，在晏殊（991-1055）門下的常賣人王青，因為遇到奇士而獲傳相術，常常幫晏府中的奴婢相命，並且每次相命結果都非常精準。受到他相命聲名的吸引，晏府夫人亦招他來為自己女兒看相，並希望他能為其擇一佳婿。⁷⁵ 另外，許多具有知人善相的士族婦女，儘管處在深閨鮮少有機會在公開場合活動，仍然以其預知能力窺見不少當時士大夫的生命前景。例如，曾任尚書右丞的胡宗愈（1029-1094）夫人丁氏，與生俱來擁有善相人的能力。她曾從窗隙遙見丞相蔡確（1037-1093），就看出其未來將遭貶謫的下場；而看到赴成都上任的李常（1027-1090）書信字跡，也準確推斷其將不久於人世。⁷⁶ 另外，光祿卿史炤之母張氏的知人方式，則是從觀察其所為而能知其貴賤貧富。當幾位赴考士人館宿於其家時，她對他們極為禮遇，因為她已經預見他們未來將「大貴，且有名」。事實證明，這幾位舉子日後果然如其所預測，仕宦顯赫地位尊貴。⁷⁷

儘管這些人未必如專職術士一般以論命賣卜為生，但他們一樣具有論命善相的能力，也在不少場域中展現他們的預測能力。筆記中這些反覆出現的訊息傳遞，包括專業術士以及諸多其他類型的預卜者，透露出當時具有知命善相能力之人的隨處可及：有些可以在特定地點、用金錢取得其預測，有些要靠機緣才能得以一窺未來，還有一些則是可能生活在自身周遭的親朋或僚屬、隨時分享他們過人的預知能力。這些知命善相者的遍在，或者說普遍為士人所關注並記載，一方面說明當時社會上對窺見未來有頗高的需求存在，另一方面也說明士人的這個需求可以獲得相應的滿足。同時，它們對於相關術數的記載內容，包括預卜術的來源、種類、預卜者的身分、居處等，也讓宋代士人和術數的接觸更為容易和可接受，甚至還能從中獲知不少在當時頗負盛名的術者之相關訊息。

第四種訊息是延續著上一類內容而來，亦即隨著具有預測能力之人的遍在，宋代社會上也隨時可見種類繁多、各具特色、又有相當精準性的各種預測之術。雖

⁷⁵ 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頁142-143。

⁷⁶ 方勺，《泊宅編》，卷4，頁26。

⁷⁷ 范鎮，《東齋記事》，補遺，頁48。文中提到的幾位舉子，分別是文彥博（1006-1097）、張昇（992-1077）和高若訥（997-1055）。其他相關的例子還很多，如信州黥卒劉快活（劉信）、楚州孫姓賣魚人等。王明清，《玉照新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第1038冊，〈劉快活〉，頁16b-17a；蔡條，《鐵圍山叢談》，卷5，頁86-87；莊綽，《雞肋編》，《全宋筆記》第四編第7冊，卷下，頁92-93。

然，有些筆記記事中只約略形容這些人具有「能言人休咎」、⁷⁸「能推人命貴賤」、⁷⁹或「語人災祥」⁸⁰的能力，但是有更多的例子顯示，他們各自運用了不同的技術，來窺探個人、家族甚至國家的命運。從下列這些明確的形容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社會上普及的一些術數種類：如「善相」、⁸¹「善相字」、⁸²「善揣骨聽聲」、⁸³「望氣者」、⁸⁴「精軌革術」、⁸⁵「精於卜／算／風鑑者」、⁸⁶「能以星歷知人禍福」、⁸⁷「善辯山水地理」、⁸⁸「推步五行」⁸⁹等。在這些用詞之中，清楚可見相術、相骨／聲術、拆字術、天文星歷之術、陰陽風水之術、卜／卦術、八字命術、望氣術，和軌革術等各種不同的預測技術包含在其中。若再進一步觀察這些技術賴以發揮的介質，會發現從人的形體、生辰和行動，到物象和地理，再到天體星象的層面都有，可以說是涵蓋天、地、人、物無所不包。在反覆聆聽或閱讀這類訊息後，宋代士人儘管未必能確切掌握這些預測技術的實際內涵，但至少對它們的類別和名稱已能耳熟能詳，而且也能有一些初步的區辨能力。

在上述這些初步知識的吸收後，有不少士人會試著將其中某些預測方式運用到自身，或是仔細觀察比對預言與現實際遇之間的契合度。若證實預測和自身經歷相符，那麼他們常常就會成為信服者，對該項術數表達認肯。例如，一位善談五行的老僧曾分析周輝的八字，提及其命為：「若非乙巳，不至今日；若無壬戌，不致竟老窮薄……，然福不成福，禍不成禍。」⁹⁰周輝應該是將老僧的這個預測深印在腦海中，所以在後來一個特別的人生經歷中體驗到預測的精確性。這個特別、也是讓其驚恐的經歷發生在淳熙十五年（1188）的除夕，當時他居住在都城臨安，突然有官方差役上門表示奉旨要他入府接受審訊對質。在府衙幾經詢問其年歲、籍貫和來歷後，差役聲稱不敢讓他久留，再三感謝後送他出門。由於他對這整個事件的發

⁷⁸ 魏泰，《東軒筆錄》，卷5，頁54。

⁷⁹ 同前引，卷6，頁65。

⁸⁰ 方勺，《泊宅編》，卷7，頁39。

⁸¹ 同前引，卷4，頁24。

⁸² 沈作喆，《寓簡》，卷9，頁82。

⁸³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5，〈草腰帶聽聲〉，頁260-261。

⁸⁴ 孫光憲，《北夢瑣言》，卷3，頁48。

⁸⁵ 龔明之，《中吳紀聞》，卷2，〈軌革卦影〉，頁206。

⁸⁶ 楊億，《楊文公談苑》，〈王延範誤惑於術人〉，頁174。

⁸⁷ 曾敏行，《獨醒雜志》，卷1，頁119。

⁸⁸ 黃休復，《茅亭客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1冊，卷2，〈馮山人〉，頁20-21。

⁸⁹ 周輝，《清波雜志》，卷3，〈日者談休咎〉，頁104-105。

⁹⁰ 同前引，卷7，〈僧譚禍福〉，頁308-309。

生感到莫名其妙，也認為極可能是一樁誤逮事件，故返家後轉而向府尹上訴。府尹表示這是司法治安部門人員的謬誤，負責其職的吏役已婉轉表達歉意，並也懲處其下失職人員。由於府尹的回應看似不想追究、且有護短的傾向，親舊認為很難再就此事進行投訴，讓周輝只能就此做罷。這個無故遭逮審訊的經歷，雖然最終以平安返家做收，仍然讓他極為介意，甚至形容其為「平生橫逆，莫此為甚」。同時，也讓他對於老僧之前所言的「禍不成禍」預測信服不疑。

還有一些士人會從中學習術數分析的原理，並試圖進一步將其原理應用在觀看其他人物的前程發展上。岳飛的孫子岳珂（1183-1243）就曾有此嘗試。雖然他的掌握能力還不及術者的精確，但其嘗試的行為本身，已說明術數訊息的傳遞對接收者產生的促進效應。嘉泰元年（1201）有善議命聲名的蜀人楊艮到九江，受到九江太守接待並讓他遍見郡官。岳珂在訪視友人時，正好術者楊艮也在場，友人以當時權震天下的韓侂胄（1152-1207）之命扣問。術者避開眾人、憂懼的回答：「是不能令終」，並且仔細從其生辰所在的干支格局，分析其所以能夠權震天下、又不能善終的原因。由於事關權臣的未來，在座聆聽者雖有喜色但不敢言說，只默默將其記錄下來。後來岳珂任職鎮江，公務中遇到吳江縣丞袁韶（1161-1237），見其有雋才而詢問其八字。由於其八字與楊艮當初所議的韓侂胄有相當多雷同，因此岳珂試著按其理路分析其命運，並詢問楊艮的意見。他從楊艮處得到的回答是：兩人之八字雖有雷同之處，但袁韶之命勝於韓侂胄，非後者所能相比。後來的發展驗證了楊艮的預測，韓侂胄於開禧二年（1207）因用兵潰敗伏誅，而袁韶則是從縣丞陸續升遷至同知樞密院事參與國家機務，岳珂「乃嘆其神」。⁹¹

從上述這些分析可以看到，要瞭解筆記記事對於訊息接收者的影響，與其從作者的寫作目的入手，不如去關注那些反覆出現的內容，將其作為觀察其社會效應的起點。很明顯的，這些和術數相關的訊息之所以會在士人社群反覆流傳，除了其內容深具戲劇性和神奇意味外，也與其中主配角的士人身分和生命經驗息息相關，因為其與士人群體的生活相契合，所以能對其產生觸動效應。無論是對談論者或是記載者而言，這些記事的目的主要都偏向於傳遞前賢士大夫的生命經驗，或是分享和展現自己的學識和見聞，而非推薦特定術數或術士的奇異能力。但是在這樣的目的下而反覆傳誦的士人與術數接觸經驗，卻對接收者產生另類的影響。由於有紀實性的口吻、著名前賢士大夫的例證，再加上準確的預測，這類記事對聽聞者產生強大說服性：術數論命是普遍、而且是可行且合理的行為。而隨處可見的知命善相者，

⁹¹ 岳珂，《程史》，卷15，〈楊艮議命〉，頁175-176。

及其所使用的各種卜算技術，則為受到這些例證吸引、進而想一窺前程的士人，提供了相關的知識和可能的諮詢對象。更有甚者，這些相關訊息，還常會激發接收者進行術數理論的理解與實際測試。

五、結論

本文從三個層次分析宋人筆記和術數知識在士人群體的傳播：首先，是對筆記何以能作為窺見士人獲取術數知識的窗口，進行詳細的論證和說明。透過筆記內容產生的場景、內容的來源、關注的對象，和流傳幅度的分析，本文顯示宋代筆記不但常是士人燕聚閒談內容的重現，而且還是士人聞見和文本知識匯集的成果。因為筆記內容涵蓋了當時士人關注的焦點，及樂於互相交流的話題，也是當時訊息傳遞管道中的重要一環，所以可以從中觀察士人術數知識的形塑。其次，是針對那些與術數相關的筆記內容，進行書寫方式、對象和型態的探究。透過兩則筆記記事的詳細分析，本文發現無論是士人或以術士為主角的記事，都是以紀實性的方式被記載。雖然記事的内容未必與史實全然相符，但是從中仍能觀察到士人與術士之間的密切互動，是與宋代士人的生活經驗息息相關；那些具有預測能力者，既是他們面對挑戰時求助的對象，也是舒緩壓力的出口。最後，則是對這些筆記內容進行解讀，以釐清他們對訊息接收者可能造成的影響。由於許多筆記的內容是由士人的聚談而來，即便在它們被收入筆記之後，也仍然常會以口傳和文本等方式繼續流傳於士人社群，因此它們的社會影響性不能從筆記作者的書寫目的來理解，而應直接從其輾轉傳遞的內容來觀察。在前賢士大夫求相問命之事蹟、術士預卜的驚人準確性，以及無所不在的術士和各具特色的術數等訊息的反覆流傳之下，求相問命之舉成為受到前賢背書的合理行為；而想一窺前程的士人，似乎也可從中獲得術數人選與技術的相關訊息。

限於篇幅和避免討論失焦，本文還有許多重要議題尚未探觸。首先，由於本文的討論聚焦於以士人為主角或配角的筆記記事，因此對於術數記事在宋人筆記中的整體呈現尚未能進行分析。除了與他們這個社群相關的術數經驗外，宋代士人又在燕聚閒談中分享了哪些流通於社會上的術數知識，他們從什麼渠道獲知這些案例、又以怎樣的模式和態度對它們進行描繪和強調，為什麼這些訊息會吸引他們的關注？此外，北南宋的歷史情境變化下，士人的生活和仕宦境遇、甚至是興趣和知識追求都產生相應改變。無論是關注焦點從中央轉至地方、從政治轉向社會，或是從

著重經典知識到對聞見知識的越發認可和看重等，這些改變如何反應在他們燕聚閒談的內容中，進而產生筆記內容的可能轉向等，也都是未來在探討術數知識傳遞時必須要納入考量的面向。唯有完整掌握筆記中的術數書寫，才有可能較清楚的瞭解筆記內容在宋代士人的術數知識傳遞中所扮演的角色。

最後，必須說明的是，誠如前言部分所述，筆記只是各種術數知識的傳遞管道之一。個人的家庭成長環境、社交網絡，和學術背景等，也都是影響宋代士人對術數知識的吸收和認知的因素。因此，筆記記事對於求相問命之舉的合理化，並不代表士人因此就對其持認同的態度，並隨之身體力行。來自其他管道的批評、懷疑，甚至是競爭的態度，也會對士人產生影響，讓他們必須在不同術數立場之間，不斷的進行選擇、調和或適應。有些士人或許會選擇認同、或反對的鮮明立場，並在不同場合貫徹這樣的態度；但更多的人恐怕是偏向採取比較彈性的作法，在不同場合與面對不同對象時，適時轉換立場以貼切情境所需。當取材於士人聚談內容的筆記，傾向於敘述前賢士大夫的各種術數接觸經驗和神奇的應驗結果時，收入士人文集中的議論和贈文，則因情境和對象的不同而往往有更多元的立場表述。因此，進一步分析和比較宋代術數知識傳遞的各種管道，將能對宋代士人與術數的接觸和互動有更整全的瞭解。這些議題有待未來更進一步的探討。

（責任校對：李奇鴻）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安石 Wang Anshi, 《臨川文集》*Linchuan wenj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105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王明清 Wang Mingqing, 《玉照新志》*Yuzhao xinzhì*,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子部第 1105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王得臣 Wang Dechen, 《塵史》*Zhu shi*,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一編第 10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 王 曾 Wang Zeng, 《王文正公筆錄》*Wang Wenzheng gong bilu*,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一編第 3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 王 銍 Wang Zhi, 《默記》*Mo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王闢之 Wang Pizhi, 《澠水燕談錄》*Minshui Yantan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方 勺 Fang Shao, 《泊宅編》*Bo zhai bi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史 溫 Shi Wen, 《釣磯立談》*Diaoji litan*,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一編第 4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 朱 翌 Zhu Yi, 《猗覺寮雜記》*Yijue liao zaji*,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三編第 10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 江少虞 Jiang Shaoyu, 《事實類苑》*Shishi leiy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1。
- 佚 名 Yiming, 《五國故事》*Wuguo gushi*,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一編第 3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3。
- 沈作喆 Shen Zuozhe, 《寓簡》*Yu jian*,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四編第 5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 沈 括 Shen Gua, 《夢溪筆談》*Mengxi bitan*,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二編第 3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6。

- 沈 邁 Shen Gou, 《西溪集》 *Xixi j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097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周必大 Zhou Bida, 《二老堂雜志》 *Erlaotang zazhi*, 《宋代筆記小說》 *Songdai biji xiaoshuo* 第 8 冊, 石家莊 Shijiazhuang: 河北教育出版社 Hebei jiaoyu chubanshe, 1995。
- 周 密 Zhou Mi, 《癸辛雜識》 *Guixin za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 《齊東野語》 *Qidong yey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周 煒 Zhou Hui, 《清波雜志》 *Qingbo zaz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4。
- 岳 珂 Yue Ke, 《桯史》 *Ting 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邵伯溫 Shao Bowen, 《邵氏聞見錄》 *Shaoshi wenjian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洪 邁 Hong Mai, 《夷堅志》 *Yijian zhi*, 臺北 Taipei: 明文書局 Mingwen shuju, 1982。
- , 《容齋三筆》 *Rongzhai san bi*,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五編第 6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12。
- 范 鎮 Fan Zhen, 《東齋記事》 *Dongzhai ji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紀 昀 Ji Yun 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Qinding siku quanshu zongmu*,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孫 升 Sun Sheng 述, 劉延世 Liu Yanshi 錄, 《孫公談圃》 *Sungong tanpu*,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二編第 1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6。
- 孫光憲 Sun Guangxian, 《北夢瑣言》 *Beimeng suoya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高文虎 Gao Wenhui, 《蓼花洲閒錄》 *Liaohuazhou xianlu*,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五編第 10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12。
- 脫 脫 Tuotuo 等, 《宋史》 *Song 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4。
- 張 耒 Zhang Lei, 《明道雜誌》 *Mingdao zazhi*,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二編第 7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6。

- 張邦基 Zhang Bangji, 《墨莊漫錄》 *Mozhuang manlu*,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三編第 9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 張 洎 Zhang Ji, 《賈氏談錄》 *Jiashi tanlu*, 《宋代筆記小說大觀》 *Songdai biji xiaoshuo daguan* 第 1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 張師正 Zhang Shizheng, 《括異志》 *Kuoyi zhi*, 《歷代筆記小說大觀》 *Lidai biji xiaoshuo dag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2。
- 張舜民 Zhang Shunmin, 《畫墁錄》 *Huaman lu*,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二編第 1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6。
- 張端義 Zhang Duanyi, 《貴耳集》 *Guier ji*,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 *Song Yuan biji xiaoshuo daguan* 第 4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 莊 綽 Zhuang Chuo, 《雞肋編》 *Jile bian*,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四編第 7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 陳振孫 Chen Zhensun, 《直齋書錄解題》 *Zhizhai shulu jiet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67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陳 鵠 Chen Hu, 《西塘集耆舊續聞》 *Xitang ji qijiu xuw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陸心源 Lu Xinyuan, 《三續疑年錄》 *Sanxu yinian lu*, 《續修四庫全書》 *Xuxiu siku quanshu* 史部第 517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5。
- 陸 游 Lu You, 《入蜀記》 *Rushu ji*,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史部第 460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_____, 《老學庵筆記》 *Laoxuean bi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_____, 《家世舊聞》 *Jiashi jiuwen*,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曾敏行 Zeng Minking, 《獨醒雜誌》 *Duxing zazhi*,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四編第 5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 黃休復 Huang Xiufu, 《茅亭客話》 *Maoting kehua*, 《全宋筆記》 *Quan Song biji* 第二編第 1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6。

- 楊 億 Yang Yi, 《楊文公談苑》*Yangwengong tanyuan*,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3。
- 蒲積中 Pu Jizhong, 《歲時雜詠》*Suishu zayong*, 《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y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集部第 1348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趙與時 Zhao Yushi, 《賓退錄》*Bintui lu*, 《宋代筆記小說大觀》*Songdai biji xiaoshuo daguan* 第 4 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07。
- 歐陽修 Ouyang Xiu, 《歸田錄》*Guitian 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蔡 條 Cai Tao, 《鐵圍山叢談》*Tieweishan congtao*,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錢 易 Qian Yi, 《南部新書》*Nanbu xinsh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02。
- 魏 泰 Wei Tai, 《東軒筆錄》*Dongxuan bi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蘇 轍 Su Che, 《龍川略志》*Longchuan luezhish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7。
- 釋文瑩 Shi Wenying, 《玉壺清話》*Yuhu qinghua*,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4。
- , 《湘山野錄》*Xiangshan yel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4。
- 龔明之 Gong Mingzhi, 《中吳紀聞》*Zhongwu jiwen*, 《全宋筆記》*Quan Song biji* 第三編第 7 冊,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8。

二、近人論著

- 丁海燕 Ding Haiyan, 〈宋人史料筆記研究——從《四庫全書總目》對宋代史料筆記的價值談起〉“Songren shiliao biji yanjiu: cong *Siku quanshu zongmu* dui Songdai shiliao biji de jiazhi tanqi”, 《中洲學刊》*Zhongzhou xuekan*, 1, 鄭州 Zhengzhou: 2004, 頁 112-116。
- 王育濟 Wang Yuji, 〈宋代王安石家族及其姻親〉“Songdai Wang Anshi jiazu ji qi yinqin”, 《東嶽論叢》*Dongyue luncong*, 22.3, 濟南 Jinan: 2001, 頁 106-111。

- 宋馥香 Song Fuxiang, 〈兩宋歷史筆記的編纂特點〉“Liang Song lishi biji de bianzuan tedian”, 《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Huazhong keji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2, 武漢 Wuhan: 2007, 頁 72-76。
- 周小山 Zhou Xiaoshan, 〈「補《全宋詩》沈邁詩六十四首」質疑〉“‘Bu Quan Song shi Shen Gou shi liushisi shou’ zhiyi”, 《古籍整理研究學刊》 *Guji zhengli yanjiu xuekan*, 3, 長春 Changchun: 2012, 頁 59-60。
- 宮雲維 Gong Yunwei, 〈20 世紀以來宋人筆記研究述論〉“20 shiji yilai Songren biji yanjiu shulun”, 《浙江社會科學》 *Zhejiang shehui kexue*, 1, 杭州 Hangzhou: 2010, 頁 97-102。
- 張 暉 Zhang Hui, 《宋代筆記研究》 *Songdai biji yanjiu*, 武漢 Wuhan: 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 Huazhong shifan daxue chubanshe, 1993。
- 張滌雲 Zhang Diyun, 〈關於王安石使遼與使遼詩的考辨〉“Guanyu Wang Anshi shi Liao yu shiliao shi de kaobian”, 《文學遺產》 *Wenxue yichan*, 1, 北京 Beijing: 2006, 頁 73-82。
- 雷祥麟 Lei Xiang-lin、傅大為 Fu Daiwie, 〈夢溪裡的語言與相似性——對《夢溪筆談》中「人命運之預知」及「神奇」、「異事」二門之研究〉“Mengxi li de yuyan yu xiangsiling: dui Mengxi bitan zhong ‘ren mingyun zhi yuzhi’ ji ‘shenqi,’ ‘yishi’ er men zhi yanjiu”, 《清華學報》 *Qinghua xuebao*, 23.1, 新竹 Hsinchu: 1993, 頁 31-60。
- 廖咸惠 Liao Hsien-huei, 〈體驗「小道」: 宋代士人生活中的術士與術數〉“Tiyan ‘xiao dao’: Songdai shiren shenghuo zhong de shushi yu shushu”, 《新史學》 *Xin shixue*, 20.4, 臺北 Taipei: 2009, 頁 1-58。
- _____, 〈宣揚「正學」: 真德秀的性命論與術數觀〉“Xuanyang ‘zheng xue’: Zhen Dexiu de xingming lun yu shushu guan”, 美國麻州哈佛大學 Meiguo Mazhou Hafa daxue 主辦, 「九至十五世紀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Jiu zhi shiwu shiji de Zhongguo guoji xueshu yantaohui”, 劍橋 Cambridge: 2014 年 6 月 5-7 日。
- _____, 〈理解天命: 文天祥的命運觀與術數知識〉“Lijie tianming: Wen Tianxiang de mingyun guan yu shushu zhishi”, 《漢學研究》 *Hanxue yanjiu*, 35.2, 臺北 Taipei: 2017, 頁 225-260。
- 劉祥光 Liu Hsiang-kwang, 《宋代日常生活中的卜算與鬼怪》 *Songdai richang shenghuo zhong de busuan yu guiguai*, 臺北 Taipei: 政大出版社 Zhengda chubanshe, 2013。
- 廖咸惠 Liao Hsien-huei 著, 上內健司 Uenchi Kenji 譯, 〈墓葬と風水: 宋代における地理師の社會的位置〉“Haka-sō to fūsui: Suka ni okeru chiri-shi no shiyakuwai-

- teki ichi”，《都市文化研究》*Toshi bunka kenkyū*，10，大阪 Ōsaka：2008，頁96-115。
- Bol, Peter K. “A Literati Miscellany and Sung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Case of Chang Lei’s Ming-tao tsa-chih,”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25, 1995, pp. 121-152.
- Fu Daiwie. “The Flourishing of *Biji* or Pen-Notes Texts and Its Relations to History of Knowledge in Song China (960-1279),” *Extrême-Orient, Extrême-Occident*, 1, 2007, pp. 103-130. doi: 10.3406/oroc.2007.1071
- Inglis, Alister D. *Hong Mai’s Record of the Listener and Its Song Dynasty Context*. New York: SUNY Press, 2006.
- Liao Hsien-huei. “Exploring Weal and Woe: The Song Elite’s Mantic Beliefs and Practices,” *T’oung Pao*, 91.4-5, 2005, pp. 347-395. doi: 10.1163/156853205774910070
- Zhang, Cong Ellen. “To Be ‘Erudite in Miscellaneous Knowledge’: A Study of Song (960-1279) *Biji* Writing,” *Asia Major*, 25.2, 2012, pp. 43-77.

Leisurely Chats, Faithful Records, and Dialogue: Song *Biji*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antic Knowledge

Liao Hsien-huei

Institute of Histor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hhlio@mx.nthu.edu.tw

ABSTRACT

During the Song,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literati elite and mantic practitioners reached new heights. Exploring the intimate social networks that tied them together requires a close examination of the sources informing the elite's mantic knowledge as well as their perception of it. Determining where they obtained mantic information, how such information was related to their interest in and contact with prognostication, and on what basis they made choices among the available mantic options are all crucial to understanding the Song educated elite's perception of the mantic arts 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prognosticators. This study analyzes *biji* (miscellaneous notes) in an effort to shed light on the circulation of mantic knowledge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Song educated elite. Song *biji* contain various accounts of the mantic skills and practices that circulated among the educated elite, and as such they provide a window into the elite's mantic world.

Key words: Song literati, miscellaneous notes, mantic arts, diviners,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收稿日期：2017. 4. 27；修正稿日期：2017. 8. 27；通過刊登日期：2017. 12. 5)